

椰風暹雨

余凡

自10月上旬开始发动的以“反就业法案”为号召的示威游行引起了各界的关注,除了各种抗议行动及演说,更吸引眼球的是,示威队伍中不单是工人和大学生,还有很多高中、初中学生参加行动,让惊诧的民众纷纷猜测是什么原因“推动”中学生走上街头?

《独立网》(Merdeka)26日引述一名当格朗(Tangerang)学生的表白,他们共17名学生被人鼓动于8日集中,等候运载的汽车将他们带到雅加达与工人、大学生会合。对于“就业法案”,他们仅知皮毛,但听信社媒散播的谣言,认定法案很多条款对人民不利。两天前,他们

就已谈论好参加示威的行动计划,当天他们脱下校服,换上毛衣、夹克等日常服饰以掩盖身份。但他们的动向被警方觉察,在开往雅加达的路上被拦截并送到警察局。

“印尼少年儿童保护协会”(KPAI)表示,根据调查,参加示威的学生来自各种不同背景,被同龄人邀约是原因之一,而其中一部分根本不知道是要参加抗议集会,有的被蒙骗说有老同学团聚,应该怀疑有招揽、利用无知中学生参加“反就业法案”的预谋,希望警方查明。协会郑重声明示威抗议并非表达意见的最佳途径,因为将危及学生们的人身安全。

根据KPAI于10日公布的资料,全国有3565名参加抗议的少年被拘留,

其中有90人因涉嫌违法暴行而被提告,其余的随即被释放。到了13日,又有80名学生被警方拘留。若与2019年所发生的示威行动作比较,这次参加集会的中学生人数显得特别庞大。

首都特区警局公关主任尤斯利(Yusri Yunus)警官宣称,在被拘留的初中生,有90%是来自“专业中学”(SMK)的学生,而学生们参加行动的途径,首先是应社交媒体上的号召,其次是被同龄人口头邀约的。警方将与学生们的学校领导协商,让校方提高监督力度。此外,学生家长也将被约谈、交流。并呼吁教育部对校规松散的国立学校进行追责。

改革后的民主政府向来都维护公众、工人、学

生举行抗议的权利,但必须在警方许可、不干扰其他人的权益并不演变为“无政府主义”暴乱为主。回顾1998年浩浩荡荡的学生运动,迫使掌权32年的苏哈多总统于当年5月21日宣布辞职,由哈庇副总统接任,实行民主开放的国家政策。那时“学生运动”的精神和目标是被国内外舆论所赞扬和支持的。

去年9月份,雅加达、日惹、泗水、万隆、锡江等城市的大学生发动了反对修改“反贪污法”(UU KPK)的示威活动,学生的理由是担心“修正法”将削弱KPK揭发贪污案的权力。后来的评论和事实都证明学生是被“别有企图”的知名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所误导,而相关媒体与KPK体制

内的“特殊团伙”有着说不清的“关系”,政府有所觉察后,才推出KPK需真正为国效忠的“修正法”。当时的集会活动就开始有中学生参与了。

印尼大学的社会学家戴西(Daisy Indira)教授认为,印尼民众尚未习惯遵守表达公共愿望的合法渠道,譬如和平请愿。他希望政府日后能更为提升让公众表达民意的通畅,何况在网络化的今天,政府更方便设置各类交流平台,舒缓民间的误解和不满。

他解释称,学生参与的示威必然有其后果,很有可能被幕后黑手操纵利用,被有计划地集合、运送及安排路向。他更希望参加集会的学生要明确了解请愿所争取的真正目标,别让学生的纯

洁意愿被“政治化”而收获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们还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阶段,他们对斗争目标究竟了解多少?别只热衷于上街示威,更何况参与暴力活动。”

KPAI也提醒执法部门在面对少年示威者时,能有合情合理的沟通机制,在维护少年的权益时不影响法律的尊严。对少年的维护是不可有恐吓、胁迫性的言词和动作。

古训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愆。”想起香港幼稚园及小学教师向学生灌输“仇视警察”的意识,不禁悚然。政客及民间团体在示威期间不断抹黑、指责国家警察,怎么不从根源上反思家长、教师的责任,尤其是那些有学生“上榜”的学校应负的责任。

孟迪

“光华号”——祖国派船来接我们了

——节选自《歌中往事逝如烟》

那天,我们乘搭的客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一路折腾,半途还抛了两次锚,好不容易抵达勿西当火车站时,远远地就看见我们要乘搭的那列老火车,正喷着满天烟雾,呜呜哀叫着,屁颠屁颠的开出了火车站。

我和叔叔赶紧跳下车子,心急火燎的在后头追赶,火车头上的雾气越喷越急,噗噗噗的声音越来越紧,车速也随着越发加快。我们死命奔跑,大声呼叫,可是距离却越拉越远,最后,我们躬着身子在铁道上喘气,万分无奈的望着火车消失在浓浓的烟雾中。我们颓丧的坐在火车站里的木椅子上,等候下午5点钟开的载货列车。

货车晚点,但也终于在天黑时开出了。火车一路走走停停,不紧不慢的龟速前行,我们坐在货物堆上打着盹,等到货车最终把我们送达小镇时,已经是午夜时分。

一下火车就觉汗毛直竖,一股寒气迎面扑来。走出车站,只听阵阵砰然巨响从黑暗中四面袭来,叫人毛骨悚然。

叔叔住在新街,从火车站门口往前直走的方向,而我住在独立街后头,得向右拐。于是我们在车站前分道扬镳。

我在轰然巨响中前行,感觉地动山摇,整个小镇被震得摇摇欲坠,似乎要被轰轰巨响所湮灭。黑暗中我向着声

响处走去,感觉像是奔向灭亡。

我走到了镇中心的大街——独立街上,轰然声响似乎就在身边的黑暗里,震的我心头发悚,双腿发软。我掩着双耳强行奔跑,渴望能尽快逃离黑暗,回到家中。我已几近崩溃。

这时,两辆大卡车迎面驶来,车头强光射到了我身上,照在了我脸上,我感觉血流骤停,全身是缺血的虚脱无力。

我赶紧低垂着头,快步闪到路旁,让车子从我身边驶过。当车子缓缓行驶在我身边时,车上的口号声像是猛兽嘶嚎,我听见车上传来一声声“嘿!嘿!支那!”的吡呼和吼叫声。我被钉牢在了那里,迈不开步子。

我不受控制的抬头上望,我的双眼与车上的点点绿光不期而遇,我的心停止了跳动。在互视的数秒间,我的灵魂逃出了躯壳,身子呆若木鸡的木立着,失去了知觉。

车子从我的身边缓缓的驶了过去,竟然没有为我停留。等到我醒来的时候,车子已经不见了踪影,只留下远处传来些许微弱的口号声。我哆嗦着急速闪进骑楼店屋底下的五家基,加快脚步往家的方向走,一眼也没敢望向那些

刚刚被钢筋铁条横扫过的店铺门面。

当我走进小巷子,回到了屋后的空地上,回到了熟悉的世界时,心情才渐趋平复安宁。

我拍打后门叫妈妈开门,我听到屋子里妈妈的惊呼。邻居们打开窗户,从黑暗的屋子里探出头来,惊诧的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我终于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夜晚回到了自己的家。天亮以后,当我还在熟睡时,我又再次到了小镇上人们茶余饭后的英雄人物。

如果当晚那辆卡车后边不是还跟着一辆荷枪实弹的军车的话,我这个“英雄人物”极有可能早已在那“嘿!嘿!支那!”声中,悄无声息的消失在那深沉的夜里。

一个晚上,邻居哥哥他们屋里彻夜火光窜动。第二天,他们家的店铺没有开门营业,后门也一反常态的紧闭着。那天起,哥哥和他的兄弟——我的玩伴们突然就没了踪影,到我发现的时候,他们一家子已经悄然搬走了,也没告别。大人们说他们家被搜出了一面五星旗。打从那时候起,哥哥家那道任我自由来去的大门也从此紧闭,玩伴们都走了,日子突然间变得寂寞起

来。

妈妈担心天花板上藏着的两大箱书籍会像哥哥家的五星旗一样被抄出来,于是命令我把它全部烧毁。

在那个黑风高的夜晚,我把藏书从天花板上抬下来,将它们付之一炬。那些伟大的革命事业,那些抗日英雄,那些地下工作者;我熟悉的江姐,成岗,双枪老太婆,林道静,杨子荣,少剑波,孱弱的小萝卜头……那些陪伴着我度过不眠之夜的英雄伙伴们,都在那个夜晚的烈焰中化成缕缕轻烟,腾空而去。

没有表态效忠的人们一个一个离去,萍姐和文哥他们一家也走了。人去楼空,从今往后,再也没有“神秘女郎”,再也没有“梦”。月光底下没有了文哥剪纸般的身影,夜色中也不会再现悠扬笛声。

邻居走得所剩无几,屋后曾经热闹过的小天地突然变得荒凉。没了歌声,没了灯光,没了孩子们的嬉闹。如今只剩下我一个,独自站在寂寞黄昏仰望穹苍。

天空一片空旷,掉队的孤雁吃力的煽动翅膀,孤零零的在灰暗的长空里飞向昏沉的远方。世界突然变得如此寂寥,不知形单影只的雁儿内心

是否迷惑,是否惶恐?

家里的收音机传出吴音莺莺凄凉的唱腔:
夜色茫茫罩四周,天边新月如勾
回忆往事恍如梦,重寻梦境何处求?
人隔千里路悠悠,未曾遥问,心已愁
清明年代问讯,寄我片纸儿慰离情……

左邻右舍一个一个的走了。有的去了棉兰,有些不知去了哪儿,更多的是去了棉兰市郊的丹南,住在废弃的晾晒烟叶的烟寮里,在那里候船回国,小镇仿佛摆了空城计。

我们也要走了。父亲变卖所有,登记回国。并在棉兰买了房子暂住,在被当成集中营的烟寮外候船。我们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出生地,这个从小生活的地方。

“光华号”来了,从集中营里接走了一批人。我们群情激昂。虽然这次未能轮到上船,但祖国是真的派船来了,有了希望。我们深信,总有一天,“光华号”会像接走这一批人一样的把我们接上船,回到我们日思夜念的祖国。

我们偷偷的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音量调到最低,低到几乎得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我们听到同胞们在

“光华号”上高呼祖国万岁,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听到船上有个新生命诞生了,取名“林光华”。我们在收音机旁跟着激情澎湃。我想象着自己站上了“光华号”的甲板上,和大家同声高歌,我想象着自己随着“光华号”——那一艘属于我自己的祖国的船,在大风大浪中航向了心中理想的国度。

“光华号”来了,走了,又来了,又走了,我们还没上船。十一到了,又是庆祝的日子。我和同学相约跑到丹南烟寮的集中营里,去和营里的人们欢度国庆。

那是个和外面绝然不同的世界。在外面,我们避开一切跟中国有关的事物。活得偷偷摸摸。而在这里,我们高唱革命歌曲,念毛主席语录,听他们诉说群体的力量如何把荒凉破烂的烟寮建成现时的大家庭。我又热血沸腾了。我想起了《青春之歌》里那激奋人心的示威场面,痛恨自己错过了参与斗争的机会,我满腔激情的听着,心情激昂的跟着他们高声唱: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
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井里汶:云凤

与心仪作家意如香挚友的一段奇缘

——从峇眼亚比是否是失踪“明惠帝”后人说起

意如香——相信印华文坛大家都知晓,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经常写文章投稿于印度尼西亚日报上,其文笔多样化,无论诗歌、散文、微型小说、社评都写的很扣人心弦。

有趣的是,我一直以为意如香是女性作家,说句心里话,喜欢他的文章,欣赏他的作品,并不是因为他是女性作家,而是他的文章每一篇都写得精彩吸引人。欣赏他的文笔精炼,词句优美,阅读他的文章,细嚼品味,能从中吸取营养,充实自己。奇妙的是,每次读完他的文章,心里总觉得似曾相识的“幻觉”。尤其是他与莫名其妙作家,关于明朝明惠帝出亡落脚峇眼亚比的探讨性文章“一个历史的发现”,曾引起当时印华文坛里“是王爷还是海盗”的一场笔战,有人把峇眼亚比的前祖诬称为“海盗”,使我很不以为然,也毅然加入探讨,因为峇眼亚比(Bagansi api api)是生我养我的故乡。

我这心中原以为是女性作家的感觉,后来机缘巧合,二十年后才揭开了“秘密”,原来我心仪已久的作

家意如香竟然是……

话说1995年清明节,我到因车祸英年早逝的弟弟廖振文坟墓祭拜扫墓,望着小相极为命的弟弟,那童稚未失,略带稚气的脸,心里一阵心酸,悲伤之余,当晚我写了一首“悼念”诗,投稿于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日报上。

1997年6月22日,印度尼西亚日报刊登了莫名其妙的一篇文章“历史的谜梦”,推测峇眼亚比的祖先可能是失踪已久的“明惠帝”。1997年10月17日又刊登了意如香的一篇“一个历史的发现”。不久后,1998年1月16日又刊登冯柏铭的一篇“是海盗,不是王爷”,引起了许多人的争论,尤其是峇眼亚比的华人。当时媒体称为“王爷论和海盗论”。但跟我小时候在家乡峇眼亚比里的老一辈讲的不一样。正巧有一天,一位同乡前辈洪若生(已故)拿了一份有关峇眼亚比开埠史的资料给我看,同时提议我根据这份资料写一篇文章,投



作者(左)与意如香、夏之云伉俪

稿到印度尼西亚日报,让广大的读者知道真相。

于是我写了一篇“我的故乡峇眼亚比”,小标题“不是王爷,也不是海盗!是……”不久后又写了一篇“峇眼亚比!您的祖先来自何方?”这两篇文章刊登后引起了许多人的议论,尤其是峇眼亚比的华人,也包括亚比里的老一辈讲的。大家都在猜作者是谁?资料那么详细,可能就是峇眼亚比人吧。

时间像流水般奔流着。

几年后,这一天阳光灿烂,万里晴空。虾城迎来稀客。几位多年不见久别的挚友到访,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带他们到“香港菜馆”。点了几道那家的名肴“凤尾虾”,“酸甜螃蟹”,“排骨酥”,“洋参鬚鸡汤”等。

正在津津有味的品尝着,突然手机电话铃声响起,一看是个陌生号码。接听后,对方直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吗?”这熟悉又陌生,却亲切的乡音,只一

时想不起来,正在犹疑着,又听道:“我是钟积三!”

“钟积三!”然后又问道:“你就是杜迈钟积三老师吗?”

“是啊!你是云凤吗?”

“云凤是我笔名。”

“果然是你廖振风!”又很高兴地说:“我是意如香,现在住在峇厘岛!”

我以为听错了,于是问道:“您是意如香?意如香是您?”

“是啊!我打听你很久了,最近陈国平同学才告知你的手机,才知道你住在井里汶。”

真是让我喜出望外和惊喜,万万没想到,我寻觅失去了联系二十多年的钟积三老师,竟然是我心仪的作家——意如香。这太让我感到意外了!那激动和喜悦的心久久不能平息,相互问候后,约好了一定要在峇厘或井里汶相聚,不见不散。

原来钟积三老师是看了我那首“悼念”弟弟的

诗,觉得所述之人很熟悉,可能就是杜迈的中医,他的挚友廖振文。后来他又看到我写的有关峇眼亚比祖先来源的文章后,推测可能就是廖振文的哥哥写的,却不知道我的地址和电话,后来才通过住在雅加达的陈国平同学探问到我的手机,令他如获至宝,马上就与我联系上了。

想不到峇眼亚比谜样的历史和明惠帝的历史悬念,更想不到我们对写作的执着,让我们相会在方块字方格里,诚如意如香老师写的,刊登在千岛日报充满激情的诗“同心结”:

是那明惠帝的文化情结
我们相会在方格里
云里飘来风
意如飘香
竟然不知底蕴情
寻寻觅觅
千百度
惊回首
二十年沧桑云烟过……

与意如香挚友的这段奇缘,真是太充满传奇性了,令我们的人生充满幸福感,更使得我们又是挚友,又是文友的特殊关系,成为永恒的人间奇缘: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